

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

赵敏俐

杨树增 著

ER SHI SHI JI ZHONG GUO GU DIAN WEN XUE YAN JIU SHI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 20 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

赵敏俐 杨树增 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4 号

20 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

赵敏俐 杨树增 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南段 376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安康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17.75 印张 4 插页 184 千字

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

ISBN 7-5419-6624-X/1·325

定 价:38.00 元

读者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厂址:陕西省安康市香溪路 16 号 邮编:725000 电话:(0915)3213310

##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之研究、史之史

——致赵敏俐、杨树增

小时候，夏夜，立志数星星，兴致盎然，数过一百，喘口气，再数。越数越多，直到脖子发酸，数得星星也咯咯笑起来，跳起来，落到场院来。……请原谅：接读来信，又看了选题论证，目录，以及导言和结语，好大气魄，“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不禁想起80年前数星星的事。但再仔细掂量，这联想，大不该。你们申请和完成的是“国家教委青年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怎得拿数星星出来作比？天上的星星是无限的，而且生生灭灭，闪闪烁烁不得以数计；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纵使丛杂，终可条理。何况你们还加上了这么多限制：20世纪，时限；中国大陆，地限；港台学人不计，华侨不计，外国汉学家不计，人限。这样便显现出当前一项有待进行的宏观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在天真与赤诚里注入意志与理智，这便凝结为理论建设意识，学术自由心态，真理追求精神，这些集中体现在你们所悄悄从事的这项科研活动中。我说“悄悄”，是从我主观感受说的，5年间虽居两地，未断音讯，却没听说过你们在搞这方面的研究。如今，突然把成果寄我，实如天降，不胜惊喜。虽然45万字的全部书稿尚未通读，而从导言，结语及4编15章目录中，已见梗概。并且，不仅从中回顾到飞逝的悠悠岁月，包括凝聚着我辈从黄土高原到白山黑水间灌注的点滴心血；而且更由以瞻望到迎面到来的新世纪轰响的辉煌，从我辈身旁呼哨而过的新一代势将汇成明天的朝霞。

要我写一篇序言。这怎么能行呢？只凭对大概内容有个粗略了解，就夸夸其谈起来，这需要有再大一些的本领。果如来信所说：

“从老师的角度”，“对相关的问题”，写点想说的什么。那自然是很自由的。不过既称“序言”，就不是灯前夜语或炉边茶话，而要随同你们的作业面世，这就使我有点踌躇了。那么，还是用书信形式谈谈“私房话”吧。说真格的，不论从什么角度，我还是有些零碎话想跟你们说说。我知道，好歹你们都不会多嫌。你们不会怀疑我是多么高兴，得知你们又有偌大收获，单说这种迎难而上的雄心壮志，就使我感到“充实”了好多。薪尽而面对烈火熊熊，是干枝也爆出了笑声。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本是你们专攻的课题，冠以“20世纪”，就如同在一个基数X上乘以N次方，半亩方塘顷刻变成一片大海。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遂令人不禁咋舌旋目望洋若而嘿然矣！“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作为一个选题，它乃是研究之研究、史之史。它的宏观理论性质，它的特殊重要意义，你们已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正如在《选题论证》中所说：“它的要义是阐述发生在20世纪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里的重大革命和发生在研究者头脑中的深刻思想变化的历史轨迹，指明20世纪古典文学研究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它在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传统中的重要作用。并为21世纪的古典文学研究提供研究方向上和方法上的借鉴。因此，它不仅是回顾历史的，而更是面向未来的。”这是一项艰巨的历史任务，它要求你们在接近本世纪尾声的90年代，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与历史学的高度去鸟瞰一个世纪的古典文学研究成就，总结它在理论上的积极成果，以促进古典文学研究的新发展，更好地批判继承文学遗产，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任务如此要求，你们就如此完成了它，历史怎能不为你们额手称庆呢！

20世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已指出过，到此历史进入了“世界历史”的时代，文学形成为“世界文学”的格局。在这种形势下，我们中华民族也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新中国的建设。20世纪的中国文学，乃是以不断嬗变的现实为源泉为基础而不断嬗变的、由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

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格局而仍显现着民族性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文化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多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不能不被型范于这个文学进程中，而整个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实际上则投影于甚至生长于这个文学进程中。这些生动的现象和事实，当然已经为你们注意所及，并给以聚焦的体认和深刻的理论分析。这是从我所阅读的4编15章目录中可以推断的。而且在确定这一选题之初，你们就全面而具体地提出了研究的内容和主要解决的问题，概括便是综合而不是片面地、动态而不是静止地从整个世纪的古典文学研究中，探求艺术发展规律和民族文化特质，我们民族数千年智慧的结晶，它的光辉，它的不朽的生命力，岂不是都必需在现世的文学和艺术实践中体现或反映吗？只有这样它才得有机缘折射到古典文学研究者的头脑中引起深刻的思想变化，从而显现出研究领域里重大革命跃进的历史轨迹。这规律在你们的论著中已充分给予证明。正如你们所扼要指出的，在这个划时代的历史变革时期，古典文学研究紧跟着时代前进的步伐，成功地完成了学术转型。由具有封建文化传统式的学术研究发展成一门具有现代科学意义的独立学科，建立了自己的学科体系，确定了研究对象，创造了一系列的概念范畴，形成了严格的学术规范。这些重大成就都是奠基并完成于辉煌的20世纪，又从而增加了20世纪的辉煌。

粗略概观，20世纪我们中国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在走向现代化的前进运动中，于取得了丰硕的建设性成绩的同时，曾一度出现过唯政治思维方式的偏差，造成一定程度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经过大力纠正后，又经历了关注本文意义和审美形式的普遍朝内转向，强调回归文艺本体，余风至今未泯。但到80年代末主流又开始

再次向外转,这首先是由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东风劲吹,同时在有力地推动东西文化间的对话与交流中,从原型批评开始,经由阐释学、解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及形形色色的后现代批评转变以后,表现出文学与社会、历史、人类学、哲学、心理学等等的再次整合。这种整合使原先仅作为背景的文化在文学研究中逐渐走向前台,成为重心。这一趋向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的表现是非常直接而突出的。话说到这里,不由得使我想起你们编著的《先秦大文学史》,“从先秦大文学看文学的文化本质”,这番道理已经被你们自己讲透了,我再来复述,当已完全没有必要。但是,如果只是说每个不满19岁的少男少女都是诗人,处在童年时期或未及弱冠的民族才得成为浑莽宏阔的“大文学”作者,只有他们才自自然然把认识、评价、审美有机地融合为一,以统一的真善美的方式来掌握世界,这论断完全正确,却犹有未尽。应该再补充说,正以如此,在洋溢着人类童真意趣的那个时代所特有的形象语言所表达的民族文化的全部内容,才最鲜明地体现着文学的文化素质。“文史哲的分流虽然是后代文学艺术独立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这决不意味着文学表现生活面的缩小,也决不意味着要对文学进行自我封闭的限制,使文学变成所谓仅仅是诉诸审美的消遣的‘艺术’。”这不正是你们在《先秦大文学史》的《结语》中所明确陈述的吗?近十年来,“中国古典文学史论”以及“中国文学主题学”一类著作繁兴,也足以为你们所曾预言的方向作证。如今,在追踪了整个世纪的发展轨迹之后,再从学术的演进与方法论的变革的高度加以综观,则是从以进化论为基础的实证主义方法论,以社会学为基础的分析主义方法论,到以文化学为基础的系统论方法论。这就把纷纭驳杂的现象条分缕析,给予了理论的揭示。所谓方法论并非取决于研究主体的爱好与兴趣,而是由体认到的研究客体的本质特性支配的。

你们指出:本世纪风云际会的历史大变革,给前此以往的几千年的中国文学“画上了一个大大的句号”,到此,“中国的古典文学

已经成为一个有着固定时限——和中国的封建社会共同终结的历史范畴。”大体说，这是不差的，20世纪中国文学确实经历了一个由古代向现代过渡并完成的进程，这界限一般由“五四”新文化运动来划分。当然，所谓古典与现代，是相对的，也是交叉错综的，但说它有个“时限”，是符合情理与实际的，在理论上界定为与封建社会共同终结，也比较精当。不过由此你们认为，这势所必至的“巨大的历史阻隔”，给20世纪的古典文学研究带来“巨大的困难”，研究者和研究对象“越来越疏远，越来越陌生”，以至于“使这种研究日渐‘冷落’，由‘显学’逐渐变成‘隐学’，由现实型变成历史型，由实用型变成基础型”。这些说法，也许反映着一定程度的切身感受或直接见闻。但是，我想也无妨甚至还必须另换一个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随着国民教育的普及和提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与发展，飞逝的历史也可能为我们敞开更宽阔的大门，古典文学对人民群众说来也可能变成为更普遍的精神食粮，古典文学中大量大量的艺术精品，作为审美鉴赏的对象，其价值是永存的，它的感人魅力也许伴随着时光的脚步而俱增。作为古典文学的研究者，研究主体对研究客体，现在以及今后，较之世纪之初，可能增加了一定程度的疏离感；不过文献积累，理论基础，信息传递，学术交流，广大读者群的关注与反馈，这些条件无疑是“过了黄河，再过长江”，“虎踞龙盘今胜昔”的。关于古典文学研究，主客体的间距，是拖远了呢还是贴近了呢？实在不好迳由表象来推断。就单依你们所属意的独特的“研究模式——它的理论体系是现代的，研究对象是古典的”，这就回答了上述问题。因为正如你们所扼要而正确指出的，“所谓现代理论体系，包括政治理想、价值观念、文化心理、审美风尚等等，是现代文明的总和，其核心就是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并不断发展的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具备了这样站在时代认识的制高点上的现代意识，就不仅能够把古典文学加以阐释，发掘其审美意蕴与艺术价值，客观地揭示其产生的特定历史和文化背景；而且必然还会把研究对象溶入理解，生发创造，根植于当代人的理性

世界,重结出当代人精神蕴含的花蕾。这就是说,古典文学不只存在于永无穷尽的文本中,而更其是活在一代代后人特别是研究者的理解中。作品的意蕴亦即“原意”由作者自己看来,是独立自在的;但当它在与读者对话中,则必将要随着不同的时代、地方而发生变化。任何作品都并非是由作者填充和密封的邮袋,一代代一方方原封不动地传递下去,而是通过阐释和理解,不停地解开这个邮袋,补充上新的内容,也同时改变或卸除某些原有的负载。阐释和理解是异代心灵的沟通,不是邮递员的工作。我们中国古典文学本世纪的新一代研究者,正是处在结束人类前史开始进入人类真正历史的时代,要参与执行一种特殊使命,完成一项光荣任务,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审美意识的建构中,承前启后,推陈出新,亦即重铸民族灵魂。新的历史形势要求着也鼓舞着,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主客体间的亲和力理应日益饱满,加强再加强,特殊条件下诸如时差等等形成的疏离感是不难消逝的。而且“批判继承”原是古典文学研究普遍永恒的原则,从无疑义;不过作为特定时代意识形态环境的反弹,“五四”当年是突出“批判”,强调“不破不立”,甚至有的不免陷入情绪化和简单化;而到世纪后期,尤其近十年来,思想界对“五四话语”的理论反思,显然放宽了“五四”全面反传统的激进立场,关注焦点与学术旨意比较突出“继承”,强调弘扬传统。即以传统诗词作例,二三十年代视同发辫、小脚,在诗坛上是倍受冷落的;到八九十年代则又勃然复兴,诗词社团蜂起,诗词报刊层出不穷,大有日趋繁荣之势。由此观之,如果说历史的巨大变革使古典文学研究者和他们的研究对象“越来越疏远,越来越陌生”,这个判断岂不是不够全面,尚容有修正或修补的余地吗?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无论通史或断代,无论专题或概说,既称作史,当然由古至今,又依今视古。研究对象产生于古代,立足点和着眼点则紧贴现实。不仅是用今天的理论去分析古人的概念,才能够得出科学的认识与确切的评价;而且也只有从现代思想与古代思想本质的联系里去发掘、去寻找,才得有所发现,有所创造。

昨天只有经过今天,才能通向明天;历史只有结合现实,才得显示意义;任何文化遗产只有根植在现实思想的土壤里,才能获得生机。历史研究决然不得止于对旧世界的解释,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也必然直接或间接关注现代文学问题。胡适的《白话文学史》,目的在于为他提出的《文学改良刍议》寻找历史渊源,建立理论依据;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则是有意为当今曲艺示范,正确认识民间文学的价值;周作人突出晚明小品,意在提倡“人的文学”;萧涤非著论汉魏乐府,实乃疏通“歌诗之路”。凡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的史论著作,无不证明文学的现代性孕育于古典性,古典性丰富着现代性;正是这一规律才形成为文学史。因此中国古典文学虽然已经成为一个有着固定时限的范畴,但研究者决不应把目光专注于我们古老民族的历史上。当然批《海瑞》说是“要害在罢官”,批《水浒》说是“要害在架空晁盖”,那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是要权谋,不是搞学术,同我们这里说的古典文学批评是两码事。顷读诗人郑敏《中国诗歌的古典与现代》,(文载《文学评论》1995年6期,是刚刚邮寄到的,巧极了!)她从西方诗歌、主要是英语诗歌中观察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得益于中国古典汉字和诗词的启发”。指出由芬尼罗沙到庞德所创立的“意象主义”,“追其源头实则是中国古典诗词”。并说明“80年代中国现代派新诗的出现与复苏,以及40年代以前的所谓西式的中国现代派新诗”,实际上乃是“一个真正的中西诗学交流的婴儿”,可以说是出口转内销的我们“古典的现代性”。诗人继而就此对唐宋以来诗词在诗艺上条分缕析地作了评说:意象,时空的跳跃,强度与浓缩,时空的变与心灵的飞跃,格律的活力,用字,境界。文章写得很灵活新颖,是碰巧读到的,其实同一主题作者于近年来已曾多次谈到过了。我们在这里没有可能对诗艺问题插进来讨论,只是由此当可受到启迪: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不只需要顾及古今衔接,也还必须关注中外影响。研究对象是中国古典,研究主体仍还必要坚持“古今中外——今日中国”这种治学亦即为人之道。这个话题说来话长,就干脆点到为止吧。

总之，古典与现代的划分，虽明确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界碑，但我们作为世纪送行人甚或有幸跨越世纪，对于瞩望中未来新世纪古典文学研究者，从总体上说，当寄以更深远更宏大更崇高的期待：要继承传统，弘扬传统，使古典与现代接轨，理应超越而不得跳跃“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追溯西方现代文学的东方源头，从自己文学源头寻找本身的营养，并综合与融合世界文学中的进步因素，带着奏响的民族风采，汇入多元的世界文学汪洋。任何研究者，都不会也不应该把目光仅仅凝滞在约定的“时限”以内。任何学术，没有脱离现实的“历史型”，没有脱离实用的“基础型”。

话说多了，亚赛脱缰野马，及时收场吧，没有起讫。只想到开头说的你们研究的范围仅限于大陆，量力而为，谨慎可行，自是经过考虑的抉择。不过，缺了港台学人，不见华侨作者，没有异族汉学家，本来群星丽天，有似掩目不见。在这项专题科研中未能把业已取得的成就全部反映出来，终属遗憾。希望再接再厉，继续前进。在续编中容有增补。大工既已告成，何不填此一篑？就算数星星吧，“噫彼小屋，三五在东”，划定一方，也不难数清楚的，要紧的是只要数一数，作为附录也好。然否？

公 木

1995年12月30日 长春

## 序

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发生了最伟大变革的世纪，也是学术经历了重大变革的世纪。古典文学的研究不但在成果数量上远迈前代，而且在学术理论上有了突破性的超越，完成了由古典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敏俐、树增二博士以此为课题，撰写了《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从时代变革与学术演进的大背景下，对于20世纪古典文学研究的状况、特点、流派等等，进行了一次世纪性的总结。本书付梓之日，正值世纪之交，作者的回顾与前瞻，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古典文学的研究，而且包含着一种对社会与文化转型的思考。

20世纪是中国社会与文化转型的一个最重要阶段。我认为迄今为止，中国经历了两次大的社会与文化转型。第一次社会与文化转型出现在春秋战国时代，演进约四百年，在“古今一大变革之会”和人类“轴心期”文化的背景下，中华民族建构了以文史哲为载体的文化价值系统，它培育了文化上的汉唐气象、魏晋风度，滋润了学术上经学—玄学—理学—实学的绵延和文学上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的递生代长，中国的古代学术，也在这次重大的文化转型中奠定了基础，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演进，但终几千年封建社会之世，它都未能超越古典学术。

而第二次社会文化大转型则发轫于近代，延及于现当代，虽肇始于19世纪末叶，而20世纪实为重点。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封建制度深刻危机的过程中，西方文化渐次涌入，进化论和欧洲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在这一社会转型的初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政治上的变革求新和思想上的探索真理，在急剧的社会变化与深重的

民族灾难的双重催化下，先是出现了康有为的改良变法与维新，继之则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一时“启蒙”、“进化”、“达尔文、斯宾塞之名腾于众人之口，见于通俗之文”（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晚明肇始的启蒙思想，在被满清贵族入主中原这一历史洪流阻断之后，此时又被声势更大的世界性的浪潮所替代和继承。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都是这一潮流的推动者。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黄遵宪、夏曾佑，他们在社会变革中程度不同地受到了西方近代文化观念的洗礼，此期在哲学、文学、史学领域都有迥异于传统的建树，其观念、思辨、理论、学说，都带有中西融合的特点，同晚明和明清之际有所不同。

20世纪初叶以后，在社会转型中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主题更加突出；延续几千年的封建政体（帝制）和有关的传统观念、旧有价值的崩溃或动摇，使“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在精神上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解放感；随着此期间西方文化的涌进，18、19世纪西方近代的科学及其精神和方法在思想文化上的传播，对“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由传统的文化心理转换为近现代人的追求意识，从而也对古典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五四”时代崛起的作家、学者，如胡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闻一多、朱自清、沈雁冰、巴金、冰心等人，他们在创造性地转化传统时，都体现了一种近现代学人的追求意识和学术思想。但是很快，思想文化的注意中心就转移到政治上来，“救亡”又一次压倒了一切。反抗侵略、寻求国家富强和社会解放，成为比思想文化上的启蒙更加现实更加紧迫的课题。1918年前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这给正在探寻真理、救亡图存的中国知识分子以比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和进化论更大的影响，许多人遂从启蒙、进化论而走向马克思主义，接受其辩证法、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五四”运动前后，在思想文化上已形成了三大派别：马克思主义文化派、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和民族主义的新儒家。这三大派的斗争和相互渗透，影响了“五四”以来中国文学、哲学和史学的发展，亦影响了“五四”以来学术的建设和发展。

20世纪中期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了统摄性的地位。在毛泽东的阶段,主要是建立了中国形态的一整套革命哲学,这种革命哲学使近代饱受屈辱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为中国的复兴奠定了基础,但又最终演出了“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其经验教训,引起了深刻的反思,并呼唤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邓小平的“历史一拨”,建立了一整套中国形态的建设哲学体系,从70年代末开始,“革命”的航向转入了“建设”的轨道,并通过改革开放,结束了几十年的封闭状态,使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作真正的对话。当代西方多种理论和方法,也随着中西文化在更高层次上的交流而被选择和吸收,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充裕的文化条件。20世纪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就是在上述的社会变革、中西文化交流、各种理论不断涌现以及马克思主义取得统摄地位而经历了不断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的。

《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正是伟大社会转型时代的学术史,它迎着世纪之交的企盼献给关注21世纪社会与文化发展的读者。我相信,是书的问世,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以及与此相关的研究,都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赵 明

1996年元月于青岛大学

## 序 二

世纪之交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已经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历史阶段,出现了许多崭新的气象。其中颇为引人注目的是撰写学术史的风气悄然兴起,出现了一系列这方面的著作。赵敏俐、杨树增二位博士所著的《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是中国古代文学学术史著作的最新成果,是一部值得认真研读的力作。

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存在较大的难度,撰写本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的学术史难度更大,甚至还要承担几分风险。这不仅在于需要阅读的文献太多,而且还因为涉及到许多学术上的敏感问题以及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先哲时贤的收录和评价。《北齐书·魏收传》记载,《魏书》修成后,北齐朝廷召集诸家子孙进行讨论,“前后投诉百有余人,云遗其家世职位,或云其家不见记录,或云妄有非毁。”最后闹得不可开交,以至于达到众口沸腾的地步。究其根源,固然在于魏收修史有毛病,但也可看出为近代同代修史的难处。这类事情在当代中国也时有发生。由此可见,撰写好《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不但要有刘知几所说的史才、史学、史识,而且还要有高尚的史德和足够的学术勇气。敏俐、树增二君具备上述条件,圆满地完成了这部书的撰写,为世纪之交的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园地再添光彩。盛世修史,这部著作的出版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日趋繁荣的一种体现,同时也为这个领域的学人进行深入研究提供了很多方便。不必说全书宏伟的框架和严密的体系,单是其中提到的众多论著和前后几代学人,就足以使人增长见识,大开眼界。那些资深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读过这部书以后,会使他回忆起岁月的沧桑和学术的变迁,产生亲切感。对于刚刚踏进这一领域的年轻

学子来说,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读书指南的作用,可以免去许多翻检之劳,成为做学问的入门向导。

书名定为《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当然要对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状况进行史的描述,两位作者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入手,成功地勾勒出了历史的大致轮廓和发展脉络。同时,他们又没有停留于此,而是站在历史和学术的制高点上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加以审视,在宏观把握的过程中贯穿着深刻的历史反思,从而使全书较好地实现了史与思的结合,既有清晰的时间线索,又有一定的理论深度,思辨色彩很强,触及到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许多基本规律,现略举几点加以说明。

和轰轰烈烈的社会变革相比,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是一门冷功夫,人们要想在这方面真正有所建树,就必须淡于荣利,甘于寂寞,耐得住冷清,坐得住冷板凳。然而,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这门冷功夫却是在社会变革热潮驱动下日益精深。凡是本世纪有成就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不管他们本身是否明确意识到,也不管出于自觉还是迫于形势,社会变革都对他们的研究工作起了或大或小的推动作用,他们实际上是通过和自己的研究对象打交道而不同程度地参与了社会的变革。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本书作者具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既看到了时代变革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正向推动,又指出了社会剧变期往往使学人产生过热的情绪,需要通过冷静的思考加以矫正。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还将继续是一门冷功夫,它如何从热烈的时代变革中汲取动力,同时从事这项工作的学人又不追赶浪潮,不随波逐流,保持自身的学术品格,确实是一个令人深思的课题。在这方面,这部著作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

本世纪以来的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也是几代学人主体性不断高扬的历史。研究人员主体性的强化,是否会影响对于中国古典文学认识的科学性?是否有碍于揭示它的客观规律?这在接受美学、阐释学等现代西方学术思潮大量涌入的情况下,已经成为学术

界关注的焦点。这部著作通过陈述历史事实给出了明确的解答。“五四”运动是一次人的解放运动,也使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开始摆脱经学的桎梏,把《诗经》等典籍真正当作文学作品来研究。对于民间文学在古典文学发展中的作用,第一次做出科学的说明。“五四”运动所倡导的科学精神,使当时许多学者形成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采用了较为先进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使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的主体性继“五四”运动之后再次获得解放,与此相应,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领域大大拓宽,研究方法和理论思考日益走向成熟,对中国古典文学发展规律的揭示也更加全面和深刻。这部学术史著作告诉我们,研究人员主体性的高扬和文学史客观规律的揭示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如果仅仅是一名鉴赏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对古代作家作品加以评说,其结论可以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甚至会和历史事实有很大的出入。但是,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者,却必须使自己的结论具有客观性,合乎历史事实,否则就难以称得上科学。当然,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方法多种多样,审视角度千变万化,研究者的素质又各不相同,这就决定了即使面对同一研究对象,也会得出相异的结论。而研究工作的客观性、科学性,正是通过无数有差异的研究者的个性体现出来的。研究者主体性的高扬,也就是人的丰富性的展开,这就必然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内涵和底蕴揭示得更加全面深刻,和作品的主人公,和古代作家实现深层次的心灵沟通和多方面的感情交流。

20世纪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是在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和域外的各种学术思潮、研究方法有着割不断的联系。本世纪以前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人员,即使完全不理会中国以外的文化发展,闭关锁国地进行自己的工作,也仍然能够成为学问大家。20世纪的情况就不同了,那些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有重大建树的人物,无一不是学贯中西的学者。从早期的王国维、胡适、鲁迅、郭沫若,到三四十年的闻一多、郑振铎,再到当代的钱锺书先生,